

9月的最后一天，北京首都博物馆迎来了“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该展览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的首场西夏文物专题展览，103件（套）西夏文物带观众穿越千年时光，走近西夏历史。



日前，“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摄

“西夏陵”成功申遗后，首展来京

# 穿越时光 走近西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 了解西夏历史和文化

西夏（1038—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民族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多民族区域政权，前期与北宋、辽对峙，后期与南宋、金并立，其疆域主要包括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1227年，西夏灭亡。

作为西夏王朝的陵墓群，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从地理位置看，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坐落于具有重要自然地理分界作用的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山前广袤的洪积扇戈壁荒滩上。

今年7月，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拥有了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西夏历史、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窗。本次展览中展出的大部分展品就出土于西夏陵。

在参展的103件（套）西夏文物精品中，共有33件（套）一级文物，包括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西夏荔枝纹金牌饰、彩绘泥塑佛头像等，涵盖瓷器、金银器、碑刻、雕塑、建筑残件等多种类型。展品全面呈现了西夏时期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艺术风格等。

于1986年在宁夏灵武市宁东镇灵武窑址出土的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引得不少观众驻足。“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颇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美，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其造型可能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扁壶腹部的圈足起放置平稳的作用……”来自山东的一位小姑娘一边念着展板上的信息，一边让妈妈现场上网查阅关于这件器物的更多信息。

扁壶的造型和功能折射出党项人的生活习惯，他们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而扁壶形状适合在马背上携带，是党项人所喜爱的生活器皿。

同时展出的1990年在银川市贺兰县宏佛塔出土的彩绘泥塑佛头像是西夏吸收继承唐文化的典型物证。从其造型风格来看，基本继承了犍陀罗时期佛造像的特点，面部圆润饱满，线条大气，富有唐代造像遗风。

##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展览部主任王怡表示，宁夏自古就是各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地。早在7世纪，居住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草原上的党项族，逐渐内迁至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繁衍生息。公元11至13世纪，党项族建立西夏。境内党项、汉等民族在经济上互补互惠，文化上互学互鉴，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

展览中，通过大量实物，观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西夏器物体现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天盛元宝（铁质）、元德通宝（铜质）、乾祐元宝（铁质）……展柜中的西夏钱币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回望历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夏建立起货币铸造与流通制度。虽有自己铸造的西夏钱币，但由于宋朝发达的经济，宋钱在西夏的流通仍然最为广泛。西夏自己铸造的铜钱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西夏文钱币将中国传统钱币形制和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合为一体，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西夏建立后积极学习中原制瓷技术，发展制瓷业，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颇深，逐渐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陶瓷体系。西夏瓷器的种类涉及生产生活、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从装饰器材和制作技法上都体现出文化交流的特征，见证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展柜中，那些既带有北宋定窑、磁州窑、耀州



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绿琉璃花纹方砖



绿釉迦陵频伽

窑印，又发展出自身特色的西夏瓷器正是见证。展出的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属于西夏瓷器中的精品，该器物小口、束颈、宽圆肩、深腹修长、暗圈足。整体造型富有端庄、稳重的美感，制作精良，工艺水平较高，体现了西夏制瓷的高水平。

西夏的金属器工艺精湛，纹饰优美，继承了中原熔铸、锻造技术，按质地可分为金银器、铜器、铁器等，用途涉及贸易、生活、宗教等领域，在纹饰风格和文化特征方面都体现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大街署东巷窑藏遗址的刻花折枝牡丹纹金碗侈口，平沿，直腹，平底。透过展柜，可清晰地看到其外口沿饰两圈细弦纹。根据展板信息，碗内底部外圈饰缠枝梅花，中间饰团花。

## 走近世界遗产西夏陵

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邀请参观者走近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数据显示，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

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

经历次考古调查、发掘，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出土文物包括陶瓷器、骨架、马具、武器、钱币、泥塑、石碑等石刻残块、建筑材料及构件等。其中，建筑材料及构件数量最多，包括砖、瓦等普通建筑材料以及脊饰、雕龙柱柱、螭首、柱础等制作精美的装饰性构件。这些遗存是西夏政治制度、多民族特征、宗教信仰、生业方式和文化与技术成就等方面的实证。

出土自西夏陵的文物不仅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展出，还在其他单元亮相。

展览现场，西夏文与汉字交互体验屏前，观众输入自己的姓，就能显示西夏文写法……不少游客输入自己的姓氏，看看相对应的西夏文字长什么样。

追溯西夏文的创制历史，离不开西夏的建立者李元昊，他命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西夏文字。经过多年研究，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在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汉文的一种，同属于表意性质方块字，由横、竖、点、撇、捺等笔画构成。

“西夏文的创制对于从‘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的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便于汉族人学习西夏文，西夏还于1190年编写了夏汉、汉夏双解通俗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今年7月出版的《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李华瑞这样写道。

本次展览展出了1975年西夏陵区7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的西夏文寿陵残碑。该文物在出土时已残碎，由五块残碑石粘接而成，为拼合后留存西夏文字最多的一块。碑额两面阴刻西夏文篆书四行，每行四字。该碑文为确定西夏陵陵主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明。

1974年在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的绿琉璃花纹方砖是西夏时期典型的琉璃建筑材料，也在本次展览中亮相。琉璃建筑构件在中国历史悠久，起源于北魏，唐代已在高等级建筑上大量使用，鼎盛于元明清时期。西夏吸收和继承了中原的琉璃制作技术，并将其应用在西夏陵的建造中，因此西夏陵出土了大量琉璃建筑构件，造型优美，制作精良，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西夏陵区3号陵南门遗址出土的绿釉迦陵频伽引起不少参观者的关注，从外形上看，它为人首鸟身，头戴四角叶纹花冠。而迦陵频伽，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妙音鸟”。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迦陵频伽纹饰出现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迦陵频伽纹饰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大多出现在壁画和金银器上。西夏迦陵频伽形象延续唐代的传统而来，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正如相关专家所说，西夏陵证实了公元11至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物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主办方提供）

## 延伸阅读

首都博物馆展览部主任章文永表示，本次展览是继去年“辉煌中轴”专题展后，首都博物馆推出的又一个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展览。首都博物馆正在策划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主题系列展览，希望通过展示世界文化遗产，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日前，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摄

## 看·世界遗产

蒂亚瓦纳科

衰落的启示

根廷和智利北部的广大地区。

然而，历史并非只有辉煌。据古湖泊学和考古记录显示，公元1000年前后，蒂亚瓦纳科及其领地遭遇过大旱，的喀喀湖水位骤降十余米，大片农田因此失去水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李默然表示，环境危机可能加剧了蒂亚瓦纳科内部社会政治压力。农业产量下降导致资源稀缺，或引发内部冲突并扰乱整个社会的贸易网络，导致蒂亚瓦纳科在12世纪上半叶走向崩溃。

英国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在《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中指出，传统的农耕知识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的是，在人们能够将其应用到正在变暖的世界中去之前，这些知识中的大部分正在消失。如果不吸取过去的教训，人类就将面临危险。

马克斯告诉记者，蒂亚瓦纳科不仅是一段被历史尘封的考古遗迹，更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8月是艾马拉人祭拜大地之母的神灵的时节，人们通过仪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这种延续至今的传统，成为连接古代与当代的重要纽带。”

肖克说，今天在遗址现场和博物馆中所能看到的，仅占整个蒂亚瓦纳科遗迹的约5%，其余约95%仍静静埋藏在地下，等待未来的发掘与研究。这不仅意味着后代学者肩负着巨大的学术使命，也昭示着人类文明探索的广阔前景。

李默然认为，研究和保护蒂亚瓦纳科等古迹有助于保存历史记忆，展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促进跨文明交流互鉴，并为当代社会提供宝贵的智慧与启示。

（新华社记者赵凯、孟宜霏、刘宇辰）



人们在玻利维亚蒂亚瓦纳科古城遗址参观。

新华社记者 赵凯摄

## 研究发现亚马孙森林正在“长胖”

据新华社电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南美亚马孙森林正在“长胖”——树木平均体形每十年增长3.2%，这一趋势与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上升相对应。

这项研究由全球热带森林科学团队开展，涉及南美洲、英国及其他地区的60多所高校，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英国《自然-植物》杂志上。

研究团队对亚马孙森林188个固定样地进行了30多年的监测，在此期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近五分之一。在每个样地中，研究人员都会测量每棵树的胸径、鉴定其物种，并多次回到现场追踪这些树木的生长情况。

为理解亚马孙生态系统的动态，团队还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森林监测框架，以地面样地为核心，追踪每棵树和物种的生存状况，并在部分站点开展碳循环过程的强化监测。

结果显示，亚马孙森林中

的大树和小树的体型都在增大，这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所带来的“施肥效应”相吻合。研究人员表示，大树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贡献巨大，这项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即便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亚马孙森林在固碳方面依然显示出惊人的韧性。

该研究还强调了砍伐亚马孙森林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并指出，大型热带树木已有数百年树龄，不能仅仅依靠种植新树，就指望它们能在碳储存或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和原始森林一样的作用。

研究人员认为，巨大树木如何应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威胁以及如何传播种子，现在已经成为关键问题。亚马孙森林中的巨树要保持健康，唯一的方法就是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果任由森林砍伐继续下去，所造成的威胁将成倍增加，最终会导致这些巨树的消亡。